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香港的割让与回归



香港的割让与回归

1841年1月25日上午8时15分，英国“硫磺号”军舰在舰长拜尔丘的率领下，擅自在香港的“占领角”登陆，进入香港。26日，伯麦率领英军，在香港举行了“占领仪式”。

1994年12月19日，在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前，一块引人注目的巨大的记时牌树立起来。它从1997年7月1日——这个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日期开始，进行倒记时。它每跳动一下，都牵动了世界炎黄子孙渴盼祖国统一的热切目光。

如果从“米”字旗在香港上空飘扬开始算起，香港脱离祖国母体的怀抱已有156年了；如果以1898年的“新界”租约算起，已整整一个世纪了。

156年来，在香港的割让与回归祖国的历程中，中国人民既有“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悲愤，也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慨叹，更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豪与骄傲。

我们习惯意义上所讲的，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香港和澳门的被割让，是这一屈辱历史的标志，把香港的156年风雨历程揭示出来，实际上也勾勒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由屈辱到自立到自强的轨迹。

因此，我们翘首盼望1997年7月1日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也需将这156年的历程一幕一幕揭开，“把酒细思量”，把酒细细思量……

一、在谋取鸦片暴利的同时，英国人把目光盯在了香港

13世纪，一位叫马可·波罗的友好的意大利人，将自己在中国的游历写成了一本书。书中对中国的极力赞美，在本来就具丰富想象力的西方人心中，化作了七彩的幻想。西方人认为，东方是个神秘宝地，上帝在那里撒满了黄金白银，甚至人们的饭碗和酒杯全是用金子作成的。从中国传过去的精美的绸缎、瓷器和玉器，无疑给这个美丽的传说提供了鲜明的注脚。去东方的黄金之地，拿取上帝本来就该给予的那份财富，成了西方列强按捺不住的渴望。当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第一个发现了可绕道前往东方的好望角时，西方列强找到了实现这一渴望的途径。

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船绕过好望角，沿着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航线，驶抵广东，强行登上了香港的屯门岛，并在岛上刻立了有葡萄牙国徽的石碑，以此为基地向大陆侵略。在遭到了香港军民的强烈反抗后，葡萄牙人被迫撤出。但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却以年租500两白银的些微代价，通过广东官员江柏，强行租占了澳门。

葡萄牙人的成功，激发了英伦三岛上的殖民者到东方淘金的欲望。为了实现“日不落帝国”的梦想，他们迫不急待地整装出发了。

1637年，英商“可甸联合会”派出了以威代尔为首的五艘武装商船，闯进中国南海，进行了第一次有规模的对华贸易行动。在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广州，威代尔虽然没有发现梦想中的黄金，但透过热闹非凡的市场、拥挤的店铺，却看到了对华贸易的辉煌前景。为了为大英帝国开辟一个对华贸易的永久的摊位，在威代尔离开广州时，密令安号商船偷偷地开到珠江口外，找寻可供驻扎的小岛。他们的目光落在了与澳门相对的香港。

此后，英国殖民者便以南亚次大陆为跳板，向古老的中国展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殖民战争。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和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曾两次派专使来华同清政府谈判，要求建立外交关系。以当时的情势而言，仍沉醉在妄自尊大的千年帝国梦中的清政府，根本不用为与外国通商来操心。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在世界市场是抢手货，出口量很大，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则使中国根本不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品。而作为当时世界对外贸易最大的国家的英国，每年却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和丝绸，使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不断增大，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搜罗大量硬通货——墨西哥银元来付给中国。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地位，在乾隆帝80寿辰之际，一向狂妄的大英帝国，派出了以特使马嘎尔尼为首的级别甚高、阵容可观的祝寿团，借祝寿之机，向清乞求通商。

尽管马嘎尔尼跪拜了乾隆，但当他诚惶诚恐地提出此行的真实目的时，还是遭到了乾隆的断然拒绝。乾隆帝不无骄傲地复函英王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至于英国想借一岛屿的要求，乾隆帝也义正辞严地声明：大朝天朝的每一尺土地，“俱归版籍，疆土森然，即岛屿沙洲亦画界分疆，各有所属，此事尤不便准行。”同乾隆的态度相同，嘉庆皇帝也拒绝了英使阿美士德的要求，并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在京城留住。

乞求失败后，贪婪的英国人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招毒计：用魔鬼的诱惑——鸦片，去赚回失去的银元。鸦片的输入，确实使英国对华贸易起死

回生。到 1830 年，英国不但不需要支付中国硬通货，反而从中国运走了 670 多万银元！

尝到甜头的英国商人欣喜若狂。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要求政府强占中国东南沿海岛屿作为推销鸦片基地的呼声越来越高。1830 年，49 名在华的英国鸦片商联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政府“采取与国家相称的决定，在靠近中国沿海地区取得岛屿一处”，以保护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利益。1833 年，曾充当东印度公司驻华代表的士丹顿，在英国下议院报告说：“将来贸易展开，如果不便由祖国直接联系，那么在中国口岸设立贸易中心，以脱离中国管制，这是很必要的。很多年来，香港是停泊的良港，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尤其是 18 世纪末叶，英法长期战争之后，及 19 世纪初期，我国的船队常常到这里来。”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派拿皮楼到广东充任贸易监督，并指示他“寻找一个适当的港口准备作战争之用，必要时可使用武力”。

1834 年，拿皮楼在观察了香港和澳门的地势后，向国内报告说：“用一点武力，……占据珠江口东面的香港，那是很有用的。”

1839 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占有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经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上来。”

至此，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在英国控制下的贸易港口和侵华立足点的阴谋正式形成了。

二、要对中国动手，英国无需找什么借口

阴谋既已形成，就要采取一种手段付诸实施。英国侵略者是怎样采取这一手段的呢？当时在大英图书馆的地上曾留下两个深深脚印的马克思写道：“泰晤士报正确指出一个问题：‘如英国人这样以航海为生的具有营业精神的民族，要用暴力向软弱的、不善于谋进步的民族，如富足的、适宜于我们经商的国家内的中国人发生关系……凡遇有故意侵略的机会时，就用不着每次都用高明的论据来证明英国有理或没理。……’这个论据在‘强权即公理’这句有名格言上，表现得更好。”

1836年，英政府派一向主张武力侵华的查理·义律为驻华的第一任领事。这个贵族出身的英国殖民者的头面人物，从美洲（他贩卖过黑奴）到亚洲，处处都留下他肮脏的足迹。他上任后，大力支持鸦片走私，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影响到国计民生和清政府的统治。在有识之士的倡议下，清政府被迫采取了禁烟的举动。1839年6月3日，这个令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广州的虎门海滩浓烟滚滚，林则徐点燃的焚烟的火焰，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人民对鸦片的切肤之恨。

一直在寻找挑衅反扑机会的英国，终于找到了实施侵略战争的借口。代表鸦片商利益的义律，一面下令所有新到广东的鸦片商船集中停靠在九龙尖沙咀海面，一面命令停泊在香港的“沃勒治”号战舰随时作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1839年9月，英国殖民者的炮声在九龙山上打响，鸦片战争的序幕揭开了。

主战的外交大臣巴麦尊，一面静观战局，一面给英国政府出谋划策。1839年11月2日，他在给政府的一封信中写道：“为了将来通商的进行，我们最好能与英国缔结一项通商条约，包括下列各项：……（7）应将一岛割让给英国（用购买或其它方式），英国可在岛上建商馆。……如果需要用武力争取这些条款，我们想英国人民、欧洲各国不会反对，至少我们认为这种策略值得一试。”此后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指禁烟）给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所有这里决定的方法（指发动战争），应不顾一切危险执行出来。”

得到政府的许可后，巴麦尊在给清政府的正式照会里，除了提出赔偿烟价等无理要求外，更肆无忌惮地声称：“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将英国全权公使所指定的面积敷用、位置适宜的沿海岛屿一处或数处，永久割让予英国政府，作为英国臣民居住贸易的地方，以便使他们的身体免受干扰，他们的资财获得保障。”否则，他威胁道，英国必“相战不息”。

在英国的一系列进攻被林则徐率领的军民抗击后，维多利亚女王急忙召开国会。巴麦尊在会上极力煽动对华采取武力报复，他狂呼乱叫道：先揍一顿，再作解释。经过周密布署，1840年，英国政府派出了以前印度总督乔治·懿律为统帅的“东方远征军”，并为他备下了48艘战争舰、540门大炮、4000名士兵。6月，侵华远征军抵达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

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腐败的清政府妥协了。当英军攻到天津时，道光皇帝急忙派直隶总督琦善同英军谈判。虽然琦善对侵略者酒席招待，极尽

卑躬屈膝之能事，但依旧改变不了他们的胃口。懿律坚持索要赔款和岛屿，并蛮横地要求清政府查办林则徐。琦善满口答应。英军见以武力威逼清政府屈服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便在9月中旬撤兵南下。

当琦善因“退敌有功”受到道光帝“嘉奖”时，他心里并不安。他许诺的割香港给英军一事，事关大清国体面，道光皇帝能否答应，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当道光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去广东代替林则徐与英军交涉时，他才试探地向道光透露了英军的条件。据有关传闻，君臣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道光听后问：英国人所要得香港是个什么东西？

琦善道：是个小渔村，在南海边上。

道光问：那能有多大呀？

琦善道：小得很，中国是一个鸡蛋，香港只是鸡蛋上的一个小点，拿袖子一抹就去了的。

道光说：那就给他们好了。

这样，当1841年1月20日义律（懿律因病回国）提出四项正式要求时，25日，琦善便在穿鼻洋的海面上，全部接受了这些条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的内容为：（1）、割让香港予英国；（2）、赔款600万银元；（3）、两国官吏平等相待；（4）、恢复广州通商。

尽管这个条约还仅仅是个草约，但义律为了造成既成事实，1月21日即迫不及待地公布了。1月25日，飘扬着“米”字旗的英国战舰，在船长拜尔丘的率领下，耀武扬威地开进了美丽的香港岛。26日，侵略者举行了鸣枪放炮的占领仪式。在举起香槟对万里之外的女王狂祝一通“健康”之后，司令官柏麦对着山峰上高悬的“米”字国旗傲慢地宣称：香港将变成由英国人永远统治的“自由港”。

香港被占的消息传回白金汉宫后，英国统治者虽然为此弹冠相庆，但是贪得无厌的侵略本性使他们对已攫取的利益并不满足。外交大臣嫌所得的赔款数额少，同时对义律同意清政府在香港收税也大为不满。为了攫取到更多的利益，英政府否决了这个草约，并将义律撤职，改派在印度干了30多年殖民勾当的璞鼎查为全权代表。

接国际惯例，英国政府既然否认《穿鼻草约》，就应当从香港撤军，但是英国却以香港主人自居，公开拍卖了香港的土地。

这就是侵略者的强盗逻辑！

代替义律来中国赴任的璞鼎查，果然不辜负英国政府的“厚望”。这年8月，他即率舰北犯，攻陷厦门、定海，又占镇海、宁波。他在给巴麦尊的报告中将这番“战果”汇报后，又狂妄地宣称：“或者北京当局必须投降，或者沿海省份将处于我们的统治之下”，“英女王即可宣布中国那些港口或者那些沿海地区将并入女王陛下版图之内。”1842年6月，从印度开来的援军到达之后，璞鼎查立即沿长江北上。8月4日，英军到达南京江面。

清政府的官员闻风丧胆，他们听说侵略军还要进攻天津的消息后，纷纷逃出京城。道光帝急忙派耆英和伊里布为谈判代表，赴南京向英军求和。璞鼎查开列了议和条件，耆、伊一字不动地全部接受。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为：（1）割香港给英国；（2）赔款2100万银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

对于香港，条约规定：中国“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既后世袭王

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由此开始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深渊，中国近代史也由此揭开了溢满血水和泪水的屈辱的一页。

香港从此开始了长达 150 多年的沦陷历史！

三、《北京条约》割九龙，《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定新界

纵观历史，以割地赔款来求得太平的前景的举动，无疑于饮鸩止渴，因为侵略者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得陇望蜀的野心。得到香港后，英国的下一个目标便落在了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九龙半岛上。

早在计划夺取香港的时候，英国即已有了占据九龙的预谋。澳门新闻纸在1840年4月25日记载：“现在附近此处（指广东）之海岛，我等行船之人俱已细心考察，其中之港口路径，并已经详细注明在行船书上。在各处船只湾泊之中，并无一处可以好过沙尖咀。……我等若得如此一处地方，不服别国分所管，自立官府管理，即系平安妥当之处。……有此等一块地方，我等所获之利益不少。”

在此前后，英军即已频繁地在九龙尖沙咀洋面活动。1841年，琦善在与英国议定《穿鼻草约》时，撤走了在尖沙咀附近“惩鹰”和“临冲”两炮台驻防的清军后，英军随即占领。9月19日，英军又“以防止中国军队的反攻”为借口，明目张胆地占领了九龙炮台。

1856年，英国以“亚罗号事件”（指清军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货船上搜捕海盗一事）、法国以“马赖神甫事件”（指法国神甫马赖以传教为名，为非所歹，被击杀一事）为借口，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英军即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得到了南九龙4平方公里的土地的永久租借权。

1860年2月，英国领事巴夏礼派兵占据了九龙。3月，又强迫劳崇光签订了租约。

1860年10月24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再次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历3月21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总局正使功勋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该地界付予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这样，在1861年1月19日，九龙南部一区又拱手正式送给了英国。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变本加厉，1898年，英国以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对香港构成威胁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整个九龙半岛作为军事基地的无理要求。6月9日，中英签署了《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条约规定：“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拓展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认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再行划定，以99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任意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意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

根据这个专条拓展的地区叫“新界”。原界址仅限于尖沙咀至油麻地，而新界则以深圳河为界，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南至丫岛，加上深圳河以南陆地以及邻近23个岛屿，总面积达975平方公里，比原界址扩大了差不多100倍。全部“租期”为100年，后因清朝官员的请求，大英帝国以示“宽容”，将“租期”减少1年。即从1898年开始，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

至于“租金”，大清国也就分文不取了。

英国对新界的接管，从 1898 年 7 月 1 日开始，至 1899 年 5 月完成。至此，通过 1842 年的《南京条约》、1860 年的《北京条约》、1898 年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在 50 多年的时间里，逐步地掠夺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这三部分习惯上统称香港），实现了其蓄谋已久的野心，在其殖民史上留下了极其丑恶的一页。

四、风起云涌的反英大起义

1841年，当琦善丧心病狂，出卖祖国利益，义律强词夺理，擅自占据香港之后，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东莞、邓淳等首先在郡学召开群众大会，联名呈书广东巡抚怡良：“琦候一味示弱，……失去沙角之后，往返再四，议欲给银割地，罢兵通商，民心不服，联名具呈，谓香港久隶版图，天朝子民，不宜弃诸外国”；“香港绅民不愿为夷，联名控诸抚院”。向政府提出抗议。因此，广东巡抚怡良不得不顺应民情，呈报清政府。而清政府为了和缓群众情绪，只把琦善撤职查办，至于香港也无力顾应了。

但是，民心不可辱，广东人民“岂忍坐视”英人横行、宝岛陷落。1841年5月30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日），广东人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元里反英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水勇头人林福祥说：“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复，……若只求旦久之安，不计存亡之理，今日尚持手鼠之端，他日必贻反噬之悔。”广西巡抚梁巨章在给朝廷的奏书也说：“此次广东省城幸保无虞，借乡民之力！乡民熟睹官兵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实一呼四起，逐令英夷胆落魂飞，骤解围困，风闻广城岌岌之际，各官日日议和，城乡远近百姓受害已深，几至民变。……现已众志成城，与英夷誓不两立……认真团练乡勇，以收复香港为首务。”为免除日后祸患，力主清政府收复香港。

对于香港本地居民而言，香港决不是“用袖子一抹就去了的”，他们对英国殖民者有切齿之恨，渴望赶走英军，回到祖国的怀抱。英军登岛之初，就遭到居民的坚决抵抗。1839年，英船停泊在尖沙咀的时候，沿海居民就在附近的井内，放下毒药，进行抵抗。船上的英人因为海水不可喝，只得用帆布袋兜接雨水解渴。在香港被占领的初期，也是这样，因此，义律不得不下令防止。那时，英人在晚间出门，往往被人袭击，警察也不敢站岗。香港政府不得不下令：晚间出门各人要携带灯笼，各家门口也要挂灯，以防被人暗中袭击，并于每晚11时后，继绝交通。他们虽然占据香港，但却陷入提心吊胆、居住不安的惶恐之中。

英军占领香港本拟以此为据点，进行贸易，但广东和香港的民众“志存报复”不愿与英人进行贸易。1841年3月，广东巡抚怡良奏：“据署水师提臣何岳钟，署大鹏协副将次稟请：英夷先后在裙带路、赤柱各处，张贴伪知县名目，其伪示以缉盗禁赌为名，阳为约束，阴示招徕，无非欲内地商民往该处与之贸易；而内地安分商民，均以非我族类，不愿与之往来。”广东商人更是一语道破他们拒绝与之贸易的实情：“尔等占据内河，强梁霸道，不过要在此通商，好卖鸦片；岂知买卖要人情愿，如今我等不愿与尔交易，尔偏要求，羞也不羞！尔之货物我们很不希罕，我们要买物，自有恭顺各国同我交易，货多得很，何必定与尔交易耶？尔如今如此可恶，我等痛恨已极，若不杀尽尔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之男子汉！”因此，一时间，岛内市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实行贸易封锁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广东和香港的人民把最终目标放在了收复宝岛上。广州和新安（香港原属新安县界）的爱国乡绅大办社学（社学的主要任务是反抗侵略，成员大都是青壮年），扩大团练（团练本是地方武装，此时成为抗英的重要武装力量）。两个团体互相联络，共同打击英军。

《南京条件》签定后，他们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决定利用自己的力量，

与岛内的仁人志士联合行动，一举收复香港。为此，他们发出了“全粤义勇民公檄”。檄文说道：“上年和约（即广州和约）之时，原议还出龙穴，退我虎门，香港也属暂留，兵端从此永息。拒知曾未逾时，而前盟顿背。……是则英夷不平，诚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惟不共戴此天，方无愧于血气……。”发出了向英人讨还血债的呐喊。

英军惊慌失措，因为当时香港岛内英军数量并不多。为了抵抗，英军召集汉奸头目卢亚景、邓亚苏、石玉胜等，收买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以备抵抗。但是，就在英军好不容易网罗到的600人中，一部分良心未泯者，在爱国心的驱使下，投奔到当地有号召力的头人黎进福和石玉福所领导的抗英队伍之中。黎进福等人领导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在将香港英军布防情况摸清后，回到广州，准备在1842年12月，与广东人民一起，分兵12路攻打香港。攻打计划是：先将敌人诱至虎门炮台，出战船截敌后路；打败英军后，再与港内的人士相呼应，反攻香港。

就在他们准备行动之际，贪生怕死的两广总督得到了消息。他深恐“衅端再起，触夷怒，势不可收”，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阻挠。结果，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义举被扼杀了。

收复香港的行动被扼杀后，香港人民并没有停止反抗，他们采用一切手段，向英军展示他们的复仇之情。那段时间，英国人连吃一口面包都要格外小心，因为说不定面包里的毒药就要让他们去见上帝。英人为了保命，不得不自己开面包铺，但那也无济于事，因为说不定那天夜里的一把火，面包铺就会化为灰烬。这些行动，手段虽极为幼稚，但却搞得英军胆战心惊，连伦敦的英国人也惊呼：香港人民“对英国人有不解之仇”。马克思曾对香港人民的反抗手段表示过深切的同情：“中国人民用野蛮的手段进行战争，使用毒药、放火和杀人，可是英国人轰击和焚烧300万居民的城市，这种行动也并不见得好些。这段历史自始至终，只能令人讨厌。”

1844年，英国人炮制了一个所谓的“人头税”法案，强迫岛内居民每年都要到警察局登记一次，并交纳1—5元的税款。这项歧视华人的法律立即遭到了香港人民坚决反对，罢工罢市。10月30日，3000多名华工返回广东。罢工浪潮持续了3个月，迫使港英当局暂缓执行这项法律。这是香港爱国同胞取得的抗击英军的首次胜利！

继1842年那场流产的大起义后，香港人民在1899年又掀起了反抗英军的武装暴动。1898年，从紫禁城里又传来了“租借九龙”的消息。祖祖辈辈生活在半岛上的吉庆围村的父老乡亲们，在邓清士的率领下，勇敢地拿起武器，反抗侵略。1899年1月，英军开始“接管”新界，组织起来的义士奋起抵抗，不惜流血牺牲，打退英军。5月，英军在大炮的掩护下，向吉庆围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吉庆围的那扇在300多年前立下的防御海盗的铁门，阻挡了英军的进攻。英军就将猛烈的炮火对准了铁门。铁门被炸倒后，英军才占领了这个村庄。

这次反英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香港人民抗击外侮，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却激励着后人，并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传统。

当本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政府而奔波时，香港人民无论在人力上还是在财力上，对革命鼎力相助。孙中山先生发动的广州、惠州、黄花岗等一系列起义，都是以香港为大本营的。此后的辛亥风云激荡神州，香港人民功不可没。

当内地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时，香港人民也揭起了反帝的义旗。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6年为响应上海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而与广东工人联合举行的“省港大罢工”等，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内地的工人运动，而且也以自己的力量，震撼了港英当局。

马克思在深切关注百年前香港和广东人民反抗英军占领香港的斗争时，就曾预见地指出：“华南人民反对外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态度的本身，很显明地指明：中国人民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着极大的危险。不多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临死的斗争。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五、港英政府拱手让香港于日本，蒋介石要协退让铸大错

1941年12月初，梦想实现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帝国主义，将大量军队集结在距离深圳河边境仅8里的地方，其目标十分明显，就是向香港发动进攻。当时，活跃在广东一带的中国共产党的东江抗日游击队，立即通知香港英方当局，要他们密切注意日方动向，并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原则出发，提出与英方合作保卫香港的意见。香港英军司令部最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派出一名少将军官，与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联系。港英方面要求东江游击队协助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东江游击队在请示中共南方分局后，派政治委员林平与港英方面谈判。中方出人，英方出武器，装备一个团的力量，共同打击日军。但当这一计划申请港督杨慕琦批准时，杨慕琦却拒绝了。

杨慕琦并非不知道日军进攻香港的明显意图，也并非不知道仅靠英军难以守住香港的现实，但他认为：即使将香港交给日本人，也比交给中国人要好。他的理由是：如果香港让日本人占了，英美协约国一方打败日德同盟国后，日方还要将香港交还给英国，而一旦中共军队进入香港，将来香港归属谁手，就难以预料了。

正是抱着这种不放弃既得利益的想法，当12月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后，英军只是进行了一些装装门面的抵抗，就在圣诞节过后向日军举起了白旗。香港的“米”字旗换成了“膏药”旗。

此后，随着世界战局的进展，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英美联军协同作战。但是，英美在一开始并没有把中国看成是平等的盟友，而只是利用中国的力量为其战略服务。英美制定了大西洋宪章，但却不制定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太平洋宪章。后来，英美为了完成他们的“欧洲第一”的战略，让中国支撑亚洲大陆战局，1943年1月11日，才不得已与中国政府签定了废除在华特权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

在废约问题上，英国一直拒绝将许多实质性内容写进新约，更顽固地坚持不放弃对香港、九龙的占领权。英国认为香港、九龙虽暂时被日军占领，但到战争结束后，它仍可以在谈判桌上收回对港九的统治权。因此也使葡萄牙人援引为先例，也没有放弃对澳门的统治权。

英国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一同协同作战的美、苏的反对。新约签定后，英国的格普理访问美国时，许多美国的高层人士纷纷质问他：为什么英国到了这时候，还仍然不放弃将香港交给中国政府的打算；1943年12月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也就此向英相丘吉尔讨个说法。罗斯福支持蒋介石的要求，他们都希望战后的香港，是个在中国管辖下的国际自由港。但是，丘吉尔仍然断然拒绝。1945年2月8日，罗斯福和斯大林在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香港的主权问题，罗、斯都希望英国把香港主权交还中国。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坚持要收回香港主权。蒋介石在1943年3月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坚持认为香港和新界在地理上互相依存，必须同时解决。可惜，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在英国的压力下，很快就屈服了。蒋介石把香港战后问题放在了一边，却把战后如何消灭“异党”——共产党放在了首位。所以，当日军在1945年8月向盟军投降时，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收回香港主权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1945年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军无条件投降。15日，

日本电台命令所有日军立即向盟军所属战区将领投降。香港的日军属华南派遣军第 23 军所辖，这个军的司令田中久一的司令部设在广州，他又兼任香港总督，因而香港应是中国广东战区的一部分。接受香港日军受降权的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蒋介石。但是，在 8 年抗战中，将燃起“兄弟阋（xì，争吵）于墙”战火的欲望压抑许久的蒋介石，此时没有以民族的利益为重，将香港的主权摆在首位，而是为了打内战的需要，忙于接受上海、南京及南方日军的受降。直到 8 月 21 日，蒋介石才匆忙令第三方面军的 13 军从梧州赴香港、九龙，接受日军的投降。

但是，这已经晚了！

就在蒋介石忙于抢占地盘的同时，由英国海军少将、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榖率领的皇家海军舰队，已经接近香港了。与此同时，被囚禁于赤柱集中营的香港政府辅政司詹逊，立即按照英国政府的旨意，返回市区组织了临时政府，并通过电台向香港市民发表广播讲话：“我是目前驻港英政府的首席代表，现已取得日方同意，在维多利亚城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准备必要的步骤，当英军抵港受降时，恢复英国的统治权，我确信英军抵港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其实，当时詹逊既没有得到日军的同意，手中也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竟以战胜国的姿态，传令日军向此后到来的英军投降，为战后英国继续统治香港造成既成事实。

因此，当中国政府派遣的受降特使到达香港后，遭到了英国方面的拒绝和反对。中国政府对此不但不据理力争，反而在 8 月 24 日宣布：“中国不会派军队去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以免引起盟军的误解。”

紧要关头迟了一步，使蒋介石在民族利益上铸成了不可饶恕的大错，罪不容诛！

六、英国对香港的虚张声势的防卫

1948年——1949年，人民解放军鏖战辽沈、淮海、平津，国民党败局已定，新中国的桅杆已经浮出了地平线。即将成立的空前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态度如何，成为英国当局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1948年12月9日，在“目前共产党人实际上已控制了中国北部，他们统治中国只是个时间问题”的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备忘录，提出了对香港前途的预测：他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英镑区与中国的贸易不会停止”，“在提供对我们有价值的产品用以购买英国出口商品方面，一个稳定的共产党行政机构可能会比现政权做更多的事情”。据此他断定：利用香港这个货物集散地的有利条件，维持或创造有形贸易的平衡，是中国新政府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柱。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出现对香港经济繁荣的破坏，“他们可能愿意暂时及使香港继续成为英国操心的对象”。

在作了上述乐观的分析后，贝文也考虑到了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可能性：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将会采取正统的共产主义政策”，而这个政策则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作为对抗，中共政府有理由采取收复香港的行动。因此，贝文又忧心冲冲地说：“如果整个中国都由共产党人统治，香港能否继续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取决于共产党人是否感到一个组织和运作良好的英国港口有利于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如果共产党人要求将香港归还中国，他们会采用战争以外的各种方法挖香港的墙角”，“他们可能通过煽动罢工，在某种程度上使香港殖民地的经济暂时瘫痪”。他的结论是：“香港殖民地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可能会生活在火山口上。”

贝文的这份备忘录，反映出英国当局无法把握香港前途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新中国政府出于经济的考虑，有可能维持香港现状；一方面又特别担心来自于中国使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收复香港的可能。

尽管英国对中国收复香港地区的担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是殖民主义者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拱手放弃任何既得利益。1948年12月10日，外交部副大臣梅休在下议院回答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的质询时，公开声明说：“我只想说明英国政府有意保持他在香港的地位”，因为“在这令人烦恼的局势下，香港作为一个稳定的中心，其价值和重要性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948年12月13日，美国内阁对中国形势的发展进行战后首次讨论。结论是赞同贝文提出的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并且指出：“中国形势的发展会使香港和马来亚殖民地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增强和支持当地的行政机构。”

就在英国当局还在伦敦谋划方案之际，香港的当局已经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付了。11月6日，香港总督葛量洪虚张声势地举行了海陆空军警的防暴演习，与此同时，又建造了防空洞、空袭警报系统、重要物资的储藏库等。香港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1948年12月24日，葛量洪又直接向英国当局发出求援的报告。他指出：介于目前的形势，“如果英国政府不明确表态，表示肯定要保卫香港的意图，他难以指望香港进入戒备状态，去应付共产党的可能入侵”。在此情况下，贝文才勉强发表了“英国愿意继续留在香港”的声明，并应葛量洪的要求，从东南亚等地调来一批敦喀兵，使香港驻军增至3万人。

1949年1月，英国当局拟定了绝密文件《香港紧急防卫计划》。根据英

军远东总司令的估计，计划提出：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香港需 4 个步兵营，1 个炮兵野战团，1 个海岸与防空两用重炮团和 1 个在需要时能立即增援的后备旅。作为军事装备的辅助，还需要建立一支警察部队。因为现时香港“虽然警察中的华员受过充分的军事训练，但在预想的紧急状态下，不能认为他们是完全可靠的”。为了摆脱“辅助警察部队只能从不可靠的来源——华人中招收”的局面，他们建议紧急考虑扩建马来团，再组建数营马来人军队。

1949 年 3 月 5 日，殖民地大臣琼斯向内阁提交了关于马来亚和香港局势的备忘录。他指出：短期内香港可能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威胁：一是左派工会可能在香港内部制造骚乱；二是难民大量由陆地或海上涌入；三是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可能从外部入侵。而要应付这三种威胁，在香港的英殖民地当局是没有力量的，因为“在全香港近 200 万人口中，愿意全心全意支持香港政府维持内部秩序并提供最低限度必要的服务的，包括警察部队和政府永久人员在内，不会超过 1 万人”。这样，必须从英国调兵。

在英国防务委员会正紧罗密鼓讨论向香港调兵之际，内阁大臣还在为此争论不休。一些大臣认为：且不管所谓的派遣军能否对付局势，英国这样做本身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共产党军队会进攻香港；共产党在中国的政策迄今为止仍是保持同非共产党世界现有的联系。而另一些大臣则认为：向香港派遣军队，是以实际行动证明英国保卫香港的决心，会产生重大的效果。首先是可能有效地阻止共军对香港发动直接进攻；其次可能使当地居民中的动摇分子聚集到英国一边，减轻对香港内部安全的威胁；再次可能会增加东南亚反共阵线的力量。

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几个月，到 1949 年 8 月，内阁才最终批准了向香港调兵的计划，同时提出：英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阻吓”中共军队不要进攻香港，同时使世界舆论确信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地位是有利的。

尽管如此虚张声势，英国政府对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持在香港的统治地位的信心依然不足。英国曾想借助与对共产主义一直持敌对态度的美国的支持，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是，对国际局势了如指掌的贝文打破了当局的这种幻想。他指出：虽然“美国是唯一能够提供财力、物力和兵力在华北对中共采取反击行动的强国”，但是，美国在蒋政府身上下的赌注已然泥牛入海，这次“它未必会采取行动；即使采取了，也未必奏效”。但是，走投无路的英国政府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在 1949 年 5 月 26 日，通知美国政府和英联邦其他国家政府，以弄清这些政府“是否愿意支持保卫香港、防止共军从大陆发动侵略的政策，并在需要在适当时期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这一政策”。

英国的试探果然碰了一鼻子灰。6 月，美国就已明确照会英国表明了态度：“美国不会派遣空军去协助保卫香港”。其他英联邦国家更不愿为英国的利益付出任何努力，对英国大都采取敷衍态度。

面对着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形势，英国不得不将极不情愿的事实——考虑与中共谈判甚至国际共管的可能性，摆在了议会桌上。贝文和琼斯认为，英国不应该与一个“不友好”、“不民主”的政府进行谈判，更不应该把香港交还给一个还未统一中国的政府，以免香港在他日成为国共双方在内战中的牺牲品。他们的结论是：英国政府只能与一个“友好的”、“民主的”、“统一的”和“稳定的”中国政府谈判香港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政府未出现之前，英国必须维持香港的地位不变。一些大臣认为，如果提出中国政府应

该是“民主的”条件，那就意味着永远关上了同中国政府谈判的大门。因为东方和西方对“民主”一词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以中国实现以西方式的“民主”作为谈判香港前途的先决条件之一，其实质是排除了同中国政府讨论香港问题的可能性。

这样，内阁会议最后的意见是：在删除了“民主的”一词以后，贝文和琼斯关于同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条件和建议，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政策加以接受。但准备以种种先决条件为借口，尽可能地拖延这种有失“绅士风度”的谈判。

可是，英国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应付谈判。如果谈判一旦开始，中国政府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英国政府怎么办？全 2323 部拱手奉还当然是剝了它的心头肉，可是找一个什么理由来获得一部分利益呢？在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对它的“保卫”香港的政策不感兴趣的时候，英国又煞费苦心炮制了“将来对香港实行某种形势的国际共管”的招数，企图在“国际共管”的幌子下，尽可能多地保留在香港的特权。

七、新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

就在英国政府的军队陆续运往香港，并惊慌失措地加强布防之际，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飘扬，新中国政府诞生了。

像欢庆解放的中国人民仔细倾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一样，英国政府也认真地听完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全过程报导。令他们感到稍稍安心的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他们的讲话中都没有对香港的前途问题表露什么意见。更令他们感到高兴的是，此后中国外交部所发表的对外声明中，对香港问题也未曾涉及。

1949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抵达深圳中港边界中国一侧，香港政府早已在另一侧部署了重兵。但抵达边界的解放军不但没有一鼓作气向香港发起进攻，反而在解放深圳后将正规军撤离边界线，只派保安部队维持边界治安。10月19日，琼斯将这些情况向政府做了汇报。他在下议院回答质询时说：中港边界是平静的，没有人向我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情。香港的形势仍然是令人满意的。关于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琼斯回答说：他们现在没有做任何不合法和破坏秩序的事情。琼斯的这些汇报，使英国政府确信：新中国政府这种镇静和稳重的态度表明，他们无意对香港采取新的行动。为此，英国也将驻扎在边界的军队后撤，只留少数警察维持秩序。

香港政府在1949年的年度报告中也说：“10月16日，中共正规部队到达中港边界的沙头角，几天以后控制了整个边界的中国一侧。没有发生什么事件。英国与中国当局在边界的关系是正常的，符合一般准则。”在1952年的年度报告中又说：“这一年发生了一些小的边界冲突，幸而没有一件足以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现在已有在边界建立更良好的关系的迹象。”

其实，新中国政府这种暂时维持香港现状和保持香港稳定的作法，虽然没有通过正式声明告诉英国政府，但在此之前已经通过新闻界透露了信号，只不过是出于英国政府的恐慌而忽略罢了。

早在1949年春，针对英国政府对香港前途和“安全”的忧虑和有关言行，香港的两家进步报刊《文汇报》和《大公报》曾先后发表社论，阐述了观点。1949年2月9日，《文汇报》在题为《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从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态度来看，他们似乎对香港的安全问题更表关切。本月2日和3日，英国防务大臣亚历山大、殖民部大臣琼斯、海军大臣贺尔都有关于如何防卫香港的显明表示。仿佛他们远处伦敦所闻到的中国火药气味，远比我们置身香港者更为敏感。但我们终不能了解此种‘敏感’的现实价值到底有多大？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今为止，从没有一言一行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还没有被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至于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的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行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2月17日，《大公报》又发表了题为《乐观香港前途》的社论。社论中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绝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中英间虽然还有些悬案如九龙城问题等未解决，只要彼此谅解，以友好态度处理，并不足以阻碍双方的邦交。英国对于中国旧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所企图，予以支持，在中国人民的脑

子里没有大不快的印象。第二，中国的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凡以平等友善与中国相交的国家，只有受到欢迎。无论什么国家总不会关上大门不与外国往还的。将来中国和平安定，加速建设，在商务上必须与外国成立关系。中国许多物产要向外输出，外国许多建设器材要向中国输入……。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大陆成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货物集散交通衔接的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1949年6月22日，新华通讯社就6月13日香港当局无理搜查中共人士方方住宅一事发表文章。文章在对英方进行谴责的同时，指出：“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一样，从来没有打算在香港制造什么‘暴行’。”

如果说前两家新闻机构的观点还是以民间的面目出现的话，新华社则代表了共产党政府的观点，也向英国政府表露了新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的信号。如果英国政府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演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闹剧了。

自1840年英国的炮舰打开了中国大门以来，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的创伤罄竹难书，饱经沧桑历尽艰难的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后，为什么不但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解放香港，反而对香港采取了维持现状的政策？

当时，或许沉浸在欢庆解放、扬眉吐气的国人对此并不理解。现在，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回过头来看这一问题，人们就会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政府的这一政策是极为明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昔日为消灭法西斯而协同作战的美国和苏联，分道扬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东西方世界进入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冷战”的时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采取了野蛮的干涉政策，对新中国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政府，要从这种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就需要一条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联系的孔道。而香港这个国际转口港的地位正适应于此。因此，新中国政府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新中国政府对香港的这种理智的举措，在政治和经济上赢得了主动。当时的英国政府即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

1949年底，当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逃遁台湾孤岛之后，英国政府对国民党所叫嚣的反攻大陆的宣传即已有清楚的认识。在11月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英国政府认为：国民党当局“除代表其统治集团外再也不代表任何东西”，“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能代替国民党当局”的政府。从中共对香港目前的态度来看，他们需要同西方进行贸易，但是，“如果不能发展这种贸易，他们最终会说，他们可勒紧裤带不要西方的经济援助”，而苏联则会极力鼓励这种观点。考虑到英国在中国贸易的利益，“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现在的条件下，不会被认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准则和实践’”。11月初，英国代表参加了新加坡会议之后，更加深了这一认识：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且越早承认越好，最迟不应晚于今年年底。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在中国“留步观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已成定局。

新中国政府也以此为契机，迈出了与西方世界进行外交关系的第一步。

但是，新中国政府的“维持香港现状”的政策，并非意味着置香港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于不顾，中国对香港的一贯立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新中国建立的 10 年前后，中国政府即在各种场合多次阐明这一立场。1957 年，周恩来总理在对上海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指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

1963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

1972 年 3 月 10 日，就西方一些国家主张将香港问题国际化、由联合国出面解决的观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向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主席递交了备忘录，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6 月 15 日，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了香港和澳门。11 月 18 日，第 27 届联大的决议批准了这一建议。

1972 年，作为西方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英国，与我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以保守党领袖希思为首的一批政界要人的访华，结束了两国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为两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契机。同时，在此前后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的外交已由“燕子低飞”的困难时期步入“凯歌行进”的新的时代。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78 年，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世界隔绝多年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纪元。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新的历史阶段的三大任务之一，提到了共和国的议事日程。

中国人民寻找已久、翘首期待的解决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终于来临了！

八、“摄人心魄的较量”

尽管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所采取的“长期利用，维持现状”的政策，使英国当局惶恐不安的心情得以缓解，但是，这种缓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解脱。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香港毕竟是中国的领土，毕竟是“借来的地方与时间”（这是一本英国人写香港的书的名字）。既然是“借来”的，最终总是要还的。英国政府虽极不情愿，但它现今所面临的对手，既不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不是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国民党政府，而是强大的共产党政府，这就促使他们必须接受这一现实。这样，英国政府在刚刚摆脱了防务香港的烦恼后，随即又陷入了对香港前途忧虑的境况。

为了解除这种忧虑，在五十年代，英国政府曾在港花大气力进行了所谓的“归宿感”的宣传。“归宿感”要求香港的居民不要以过客的心情留在香港，而要视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乡。在这表面的言词之下，实际上的潜台词是：要效忠于女皇，效忠于香港的英国政府，不要胸怀异志地忠于祖国——中国，因为香港将来也是英国的。“归宿感”明说就是把自己“归”于香港，暗说就是以身许英国。

然而，从官方不断地强调宣传也可以看出，尽管也有人申请归化英国，入英国籍，但对居住在这个城市的400万人而言，“归宿感”却是十分稀薄的。

历史进入70年代，随着1997年的日趋来临，香港的归属问题也渐渐成为引世人瞩目的焦点。在香港的中外投资者，在两大强国迟疑不决之际，都做尽快归本的打算，而对长期性投资不感兴趣。在此期间，香港舆论关于1997年香港前途问题的报道和文章日益增多。凡此种种都表明，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此，英国首先决定派人到中国进行试探，了解中国方面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意向。

1979年3月下旬，英国驻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在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港督政治顾问魏得巍（后任27任港督，改名卫奕信）的陪同下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香港问题。3月29日，当时的邓小平副总理接见了他们。在会谈中，麦里浩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向邓小平提出，允许英国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的新界土地契约，把新界契约原来的年限规定，改为“在英王管治此区一直有效”。英国政府这一要求，显然是想通过各种办法将对香港的管治权超越出1997年。对此，邓小平给予严肃地拒绝。但他对麦里浩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者放心。”

4月6日，在麦里浩回港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记者说：我访华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接触能获得一个概括的印象，即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中将担当何种角色，以及这种计划又将怎样影响香港。对此，他转述了邓小平的话，也将“请投资者放心”的话抛给了港人。

麦里浩访华，在中英双方充满迷雾的香港问题上开启了31 一个接触点，中英双方意识到，鉴于1997年的来临，两国“进行接触”已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此后，两国通过各种场合表露自己对此的观点。1979年5月，中国外交

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在会见法国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指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租约期满时，我们将以适当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针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6月13日，英国下议院在就麦里浩访华一事辩论时，外交大臣毕力嘉也明确地表达了英国的立场：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而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认为麦里浩访华的行动，并非意味着英国政府想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因为在现时还不存在一个“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这个“适当时机”是什么时候，1980年英首相卡拉汉访华时说“两三年以后”。

于是，“两三年以后”的1982年1月4日到8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北京会见英国副外交大臣艾金斯时，代表中国政府系统地阐述了对香港问题的立场：（1）在较近的将来，中英双方进行讨论；（2）中国方面的态度将是合情合理的；（3）在作出正式安排之前，希望双方都不要做任何有损于香港经济繁荣的事。

赵紫阳所发出的谈判“邀请函”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回应。1982年9月22日，被世人视为“铁娘子”的联合王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着大批智囊谋士、新闻记者来到了中国，中英两国围绕香港的前途问题，开始了国际社会所说的“慑人心魄的反复较量”。

9月24日，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这两位被国际社会公认的铁腕政治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解决香港问题正式摊牌。

撒切尔夫人的立场甚为强硬：中英谈判只有在承认“三项条约”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下去。

邓小平针锋相对：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同意英国延长统治，就有如过去李鸿章和清廷卖国贼以非法和无效的条约把中国领土割让给英国，中国肯定要收回主权，而主权包括治权；英国必须下旗归去，英国总督必须离去；中国政府唯一有权决定对香港未来的适当政策；不迟于一、二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撒切尔夫人有备而来，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她切转话题，危言耸听地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面带微笑，平静地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尽管分歧如此大，但两位领导人还是达成了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的一致。

会议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步出人民大会堂，不知是由于会谈精神高度集中，导致精神恍惚，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一向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她，在下台阶时忽然一个踉跄，跪倒在地。——这一小小的插曲，使人们很难看到福克兰战争中那位指挥若定的统帅风度了。

在离开北京前回答记者提问时，撒切尔夫人说：“我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友好的。我们承认有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目的大于分歧。”并进而明确表达了英国政府的立场：“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在双方未同意做出其他安排之前，英国将以条约处理香港问题。”

27日，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又重申了“三项条约”是“有法律根据”的强硬态度，并向香港许诺：“我会承担作为英国首相对香港的责任。”以争得所谓的“港人意愿”，为与中国较量增加筹码。

对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重申中国的严正立场：

“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定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拘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香港整个地区。中英双方都希望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为此将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中英两国毫不隐瞒的分歧，给即将进行的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既然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要揭开阴影使前途明朗，就必须寻找到求同存异的契合点。这个点在哪里？中英双方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寻找着。

邓小平创造性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将这点落到了实处。

九、“一国两制”为中英谈判奠基

历史形势的发展，常常会超过人们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而每当这种情况来临时，又往往是扭转局势的机遇。要抓住机遇，就必须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来重新认识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将从母体分离多年的香港重归祖国的“适当时机”来临时，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坚强决心背后所依托的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国策。

“一国两制”方针的产生，有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时间可追溯到1974年，当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

1974年10月，“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是这样说道：解放台湾有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两种，即使台湾解放，我们也不会把大陆的政策搬过去。1979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时，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张：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一提法了，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应该是“一国两制”的最初设想。

此后，“一国两制”的构想，几经中国领导人的阐发，大大丰富了内涵。

1981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宣布台湾回归祖国的9项条件时说：台湾在实现祖国统一后，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又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至此，“一国两制”的概念，开始正式使用。

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解放台湾问题的同时，还将目光放在了香港和澳门。他说：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我们正在逐渐地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澳门也属类似的问题。

1982年9月，当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进行“慑人心魄的较量”时，正式提出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来解决中国收回香港主权问题的主张。他对撒切尔夫人说：这一设想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它的根据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说到这一设想的实行，邓小平很幽默地解释道：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中英谈判开始后，中国政府与英国谈判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即是以“一国两制”的构想拟定出来的。

可惜，当时的撒切尔夫人仍沉浸在刚刚打赢的马尔维纳斯岛的喜悦之中，殖民主义残梦的阴影，使撒切尔夫人没有足够的勇气正视现实。英国政府的谈判代表仍然坚持三项条约“有效论”为谈判前提，在遭到中方的驳斥后，又抛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致使中英双方近10个月的第一阶段会谈，一度陷入僵局。

在此期间的1982年12月，“一国两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列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可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规定。”这就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谈判陷入僵局后，英方仍抱着殖民主义的残梦不放。对此，中国政府做

出相应对策，敦促谈判的继续进行。1983年6月，香港报纸披露，邓小平副主席在会见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代表时表示：中英谈判若于1984年9月尚无协议，中国届时将公布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一消息的披露，在英国政府看来无疑是一张“最后通牒”，立即引起了英政府的惊慌。女王在国会年会上，不得不表示英国政府有继续谈判的诚意：“政府将会继续就香港前途与中国谈判，以期达成一项为本议会、中国及香港居民都能接纳的解决办法。”

7月1日，中英两国同时发表公报，宣布香港前途问题第二阶段会谈将于7月12日在北京开始。

重新开始的第二阶段的谈判，起初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英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幻想。这一方案的实质是：在英国放弃对香港名义主权的前提下，达成某种修改后的条约，以延长英国对香港的治权。英国振振有词的阐述了理由：第一，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第二，香港总督要代表500万香港人的利益和意愿。为了实现这一方案，他们精心构筑了一条“三脚凳”。

这是1982年12月10日，英国外交部及联邦事务次官贝尔斯特德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他在回答记者“英国政府能否就中英谈判向香港发给一些信号”的提问时说：我们想要的是一张三脚凳，第一只脚是可以为北京领导人接纳的；第二只脚是可以为英国国会接纳的；第三只脚是为香港人接纳的。抛掉一只，台就倒了。

为了为“三脚凳”方案造舆论，在中英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前的7月7日，港督尤德声称，他将以前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500万香港人参加谈判。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容忍这种混水摸鱼的手段。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尤德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谈判只能代表英国政府。为此，外交部在9日拒绝发给以“港督私人新闻主任”身份赴京的曹广荣的入境证。

“三脚凳”虽然被关在了谈判大门之外，但是在谈判桌上，英方依然不改“以主权换治权”的老调，致使前4轮的谈判结束后，前景没有明朗转机的迹象。

中英谈判前途黯淡，导致香港政局不稳。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也认识到香港“正面临着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的严重后果。为避免这种后果的发生，10月，撒切尔夫人捎来口信，表示原则上同意中方的12条方针。

英方向“一国两制”的契合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谈判进入正确的轨道。

1984年4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问北京，对谈判的进展表示了关注。中英双方发表的新闻公报，向世人通报了谈判的明朗前景：“双方一致认为，会谈已取得了可贵的进展。”20日，杰弗里·豪在香港发表的声明更令人振奋。他说：“要达成一项使香港在1997年以后仍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目前英国的方针“是与中国政府研究怎样可以达成会确保香港在1997年之后，在中国主权下得到高度自治权，并且会使香港的生活方式及现行制度的本质得以维持不变的按排”。

历经1年多的谈判，英国终于正视了现实，真正将谈判落脚点放在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上。

在谈判紧罗密鼓进行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阐发“一国两制”

的丰富内容，以期让世界了解中国政府的谈判诚意。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同来访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经担任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谈话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可以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不同，香港是自由港。

同年的5月18日，“一国两制”的提法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和收回中国领土主权的方针的概括性语言。

6月22日至23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说：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他强调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500万港人利益的。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总设计师”的一系列讲话，对推动谈判的进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随着谈判的顺利发展，英方也逐渐认识到了“一国两制”的巨大作用。7月27日，再度访华的杰弗里·豪由衷地说道：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它能够保持香港在1997年以前和以后的繁荣和稳定”。

中英双方既有如此共识，谈判也进入了顺利进展的阶段。8月1日，中英双方公布了成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这预示着中英双方最后协议的签定，已经为期不远了。

十、鉴定《中英联合声明》

1984年9月5日，中英双方的第二阶段的第二十二轮谈判开始了。中方首席代表周南和英方首席代表伊文思握手致意后，周南意味深长地说：你到北京后，经过冬天、春天和夏天，现在已是收割庄稼的秋季了。伊文思含蓄地回答道：在英国，九月份也有一个庆祝秋收的节日。两位首席代表的话外音，意味着两年来的紧张谈判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9月26日，周南和伊文思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郑重宣告：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时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

周南和伊文思把盏举杯，共庆“丰收”，并向世界公布了这一“丰收”的喜讯！——中英谈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联合声明”草签后，中英两国依照各自的法律程序进行了审议。

1984年11月6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代表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的全部文件，连同以上报告和说明加以审议”。11月14日，六届人大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联合声明”。

1984年9月26日，即“联合声明”草签的当天，港英当局散发了英国政府《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协议草案的白皮书》。《白皮书》向500万香港人郑重宣告：中英两国业已达成的协议，“是两个主权国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承诺”；英国政府相信，“已成功取得一个符合香港人的需要和意愿的协议”。为此，《白皮书》强调指出：“为避免有任何误解起见，英国政府有责任清楚说明，除了接受本白皮书所载的协议外，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英国政府的意见是：要更改这份协议是不可能的。假如不接受这份协议，就会没有任何协议。”“这并不是英国政府设法强使香港人接受的选择，而是一项历史事实遗留给香港人的选择。”

10月9日，港英政府市政局会议通过接受关于香港前途协议草案并向市民推荐；18日，香港立法局经过3天的辩论，通过罗保动议，决定接受并向香港人推荐协议草案。

12月6日，“联合声明”协议草案摆在了英国下议院的桌上。经过6小时的辩论，下院批准；10日，上院在进行了5个小时的辩论后，一致通过。

沉溺了143年的“日不落帝国”梦，如今已是“梦醒时分”！

1984年12月19日，入冬的北京已是寒气袭人，但是，人民大会堂内却春意盎然。17时30分，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等中英领导人参加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举行了。

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铺着墨绿色绒布的长桌本国国旗一侧入座，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上各自的名字。

“日不落帝国”在亚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在撒切尔夫人的签名落笔后，永远从帝国的视野中消失了；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最后痕迹，在赵紫阳的签名落笔后，从此洗刷干净了。香港未来蓝图的新的一页，由中国人民开始构画了。

1984年12月19日，成为彪炳史册的时刻！

当天，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会谈。与两年零三个月前来北京相比，撒切尔夫人重负已释了，因为香港的历史和现实使她摆脱了殖民地迷梦的羁绊，正视现实了。两位本世纪的风云人物的会谈，不再是“慑人心魄的较量”，

而是平等、祥和的祝福了。邓小平所说的“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话，也成为撒切尔夫人此刻的心声！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是这样评价这“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在紧张的对抗不幸地笼罩着世界许多地区的时候，对香港未来前途的谈判取得成功，将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有效的、静悄悄外交的一项极为突出的首例。这是中英两国政府的智慧、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富有想象力的思考的胜利，对所有认为决心、政治意愿和建设性对话可以克服最难以逾越的障碍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一项极为突出的首例”，首先“鼓舞”了葡萄牙政府。在中国政府提出收回澳门的问题上，葡萄牙政府采取了合作的良好态度。中葡双方只经过几轮会谈，便达成了协议。1987年4月13日，两国代表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将在1999年收回澳门的主权。

而作为这“一项极为突出的首例”的核心指导思想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则不仅“是中国领导人把香港变成争取全国统一伟大计划的最好武器”（《自由比利时报》语），而且“可以为未来的政治哲学开一新纪元”，并“足以开创未来世界的新局面”（梁厚甫语）。

十一、香港过渡时期的风风雨雨

1985年5月27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换文生效，香港开始了长达12年的过渡时期。

中国政府为忠实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在声明签署仅仅8个月后，就开始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祖国的统一大业负责，对几百万香港同胞负责的责任感，采取了一种不忘历史、尊重现实的求实态度。在起草基本法的条文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并广泛听取和吸纳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荣毅仁语）。经过4年8个月的努力，1990年4月，一部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奠定法律基础的、并为英国朝野政界人士所首肯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诞生了；香港未来的政治蓝图日益清晰可见了。

1992年7月3日，“慕莲夫人”号横渡维多利亚港，送走了第27任港督卫奕信，10日，迎来了第28任港督彭定康。这年49岁的彭定康，是历任港督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第一位由职业政治家而非由殖民地官员或外交家出任的港督。

以一位职业政治家替代一位职业外交官而任港督，伦敦此举意味着什么？

前任港督，为香港过渡时期的平衡，在中港英之间发展了和谐的关系，为人们所敬重。彭定康的到来，是为卫奕信时代画上句号还是继往开来？

正在人们为此关注之际，7月10日，彭定康在就职演讲中明确表示：在他任职期间，将为中英两国间建立彼此间的信任而竭尽所能。这就是说，他将为卫奕信时代继往开来。

然而，正当人们对他的这个言词中肯的演讲寄予厚望时，10月7日，彭定康却带着一副香港人的“救世主”的神态，抛出了令世人震惊的“政改方案”：《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

尽管彭定康信誓旦旦地保证，“政改方案”都是在“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条文的范围内，尽量发展代议制度”，“所有建议都符合基本法的条文”，但是，熟知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人都明白，彭定康所要“尽量发展”的“代议制度”是个什么货色。

英国殖民历史上，每当要从一块殖民地“光荣撤退”时，几乎都要进行“政制改革”一类的活动，在实行自治的一段过渡期内：首先民选立法机构，扩大立法机构的权力，成立“议会”，产生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其次，逐步实行公务员本地化。这两步实施完毕后，总督撤退，在“还政于民”的幌子下，英国对殖民地独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控制权。

英国准备将此法在香港炮制施行，不始于彭定康，早在中英关于香港谈判时即已有所表露。当中英谈判的落脚点聚集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时，英国即开始为其“光荣撤退”作准备，英国当局以“英国对香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为名义，加速推行“代议制改革”。1984年7月18日，港督尤德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了《代议制绿皮书》；同年11月21日，就在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前一个月，《代议制白皮书》又出笼了。

然而，英国在其它殖民地屡试不爽的这一招数，在拥有强大主权的中国却行不通了。“代议制改革”一出笼，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政制改革是英国搞的，中国将“不承担义务”。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也正式讨论了“代议制改革”问题，并一致同意将政

制改革的落脚点，放在“香港政制应与1997年后保持连续性、注意前后衔接”这一基本点上。1985年11月30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发表的公报指出：“双方同意香港政制的改革和基本法衔接是一个重要问题。”

现在，彭定康无视中英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在他所炮制的彭氏“政改方案”中，所包括的行政局和立法局分家、立法局1995年选举两大方面，从根本上超出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范围。对此，中国政府立即表明了严正的立场。

10月8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出：我们注意到彭定康先生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包括对香港现行的政治体制做出重大改变的内容，还注意到他对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一套打算。这些决定和“建议”都是在没有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对此深感忧虑。我们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假使香港在后过渡期发生的任何改变不能同基本法衔接，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其有关机构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的有关规定加以设立。

10月20日至23日，在彭定康上任后首次对北京的访问时，钱其琛外长毫不含糊地指责他：“政改方案”明显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和精神，违背了英方关于要使香港政制发展与基本法相衔接的承诺。

在彭定康离京之际，鲁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政改方案”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义正辞严地声明：我们认为目前双方的分歧的实质不是什么加快不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问题，而是究竟要合作还是要对抗。我们不希望见到对抗，因为这对香港不利，但对方一定要对抗，我们也只能奉陪。

与此同时，10月28日，中国公布了中英双方就香港政制问题磋商的7份文件，将英方当时的承诺昭告天下。

从保证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良好愿望出发，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从1993年4月至11月进行了17轮磋商，希望就香港1994年、1995年的选举安排达成协议。在会谈中，虽然英方不断横生枝节，但中方为推动会谈仍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表现了巨大的诚意。但是，英方已置“老牌绅士”的脸面于不顾，在1993年12月初，港督彭定康在中英关于香港政制会谈尚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悍然宣布将其部分选举方案公诸香港宪报并提交立法局审议。

中英谈判破裂了。

虽然世界的炎黄子孙希望英国成为“迷途知返的羔羊”，揭开香港前途上再一次蒙上的这层阴影。但决不为香港卜问前程。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讲：中国敦促英国执行联合声明，不是把香港平稳过渡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中国政府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包括依靠600万香港同胞的力量。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恪守中英联合声明的坚定决心，已向世界展示了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光明前景。

在我们的文章问世之际，中英“联合声明”协议草案已签定12年了。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块牵动世界炎黄子孙的“倒计时”牌，所显示的时间不足20个月了。据有关新闻媒介报道，1997年7月1日香港各大酒店、宾馆的客房都已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订满了，很多人为能目睹解放军进驻香港、香港主权移交这一历史盛会而自豪。

1997年7月1日，炎黄子孙期盼的历史时刻！世界瞩目的历史时刻！

